

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的诞生

70多年前,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在敌人的经济、军事封锁下,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重重困难中诞生。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陈列的《毛泽东选集》。

整风运动的学习风气提供了有利的氛围

1941年至1942年间,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了大型文献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前者收录文件500多件,后者近200件。1943年10月,又编辑出版了《两条路线》(上下册)。以上这些文献集的出版,对整风运动中帮助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提供了有力帮助。特别是《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这两部文集,收录了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及文件上百件,为系统全面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194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提出要在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晋察冀分局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任主编。

实际上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出版之前,邓拓及其团队已出版多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为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进行了各种准备。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编排印刷过程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当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等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为河北省阜平县,属太行山山系,境内地形复杂,条件异常艰苦。作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的《晋察冀日报》,在山区办报本已举步维艰,再加上蓄意破坏,更是难以继。在经济、军事的重重封锁下,物资供应成了最大难题,连印刷用的白纸都难以买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约物资,报社自行造纸印报,省出白纸印《毛泽东选集》。

为了不出错误,保证印刷质量,从排字、打纸型,到垫铅板、印刷,再到装订,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如在校对制

在当时的环境下,该版《毛泽东选集》在编排上还是比较系统而完整的。在体例上,成书肖像页后面依次是扉页、版权页、编者的话、总目录。在编排上,按照内容共分为五个分卷,共29篇文章,46万多字,第一卷包括《新民主主义论》等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著;第二卷收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等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著;第三卷收录《论持久战》等3篇,为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收录《论合作社》等3

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看,该版《毛泽东选集》所收录的文献比较原始,少有修饰和加工的成分,具有特殊的价值。通过与修改本的比较,可以追寻概念的变化和思想的脉络,从而为进行历史和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晋察冀日报社》中,聂荣臻元帅在序言里这样称赞道:“《晋察冀日报》始终不懈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不仅在报纸上,还在报社出版的书刊上,不时刊载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和毛泽东思想的记述,并于1944年5月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一部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建立后,主要负责接送来往中央领导、传递秘密文件和采购运送重要物资到中央苏区等任务。为保障上述工作在险恶环境中顺利完成,全体交通员创立了一套独特复杂而又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

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在交通线建立之初就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专门对秘密交通站的设立和运行进行了缜密安排。出于安全考虑,交通站工作的形式十分隐蔽,家庭、当铺、茶馆等都是其常用的掩护方式。传递情报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用密写药

水将文件写于衬衫上,或印在字画、手绢以及线装书的反面。运送黄金、电台零件和药品等物资的方式也不一而足,交通员随身携带的纸伞杆、裤带,甚至手里的甜瓜瓢,都是其藏金之处。

执行护送任务时,交通员一般是两人一组,一前一后分别行动,前面的交通员负责探路,查明是否有危险,后面的交通员则与首长同行,保卫安全。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前者会及时发送事前约定的危险信号,后者则进行紧急隐蔽。整个漫长的交通线上,一般每隔10到40公里,就会设置一个少则1人多则5人

央和中央苏区信息传递的重要窗口。各种重要的信件、情报借此得以及时传递,显著改善了先前中央不了解地方实际、地方摸不清中央意图的状况。通过这条大动脉,紧缺药品、食盐、印刷品以及军械、无线电器材等物资陆续被运往中央苏区。



中央红色交通线大埔中站。

度上采取四校及外聘专家校勘相结合的制度;在精装本的印制方面,联合《晋察冀画报》社制作铜版毛泽东像。在当时没有烫金机从而无法印制烫金效果的情况下,邓拓发动群众想出手搬机下生炭火烤热转盘代替烫金机的办法,印出烫金版《毛泽东选集》精装合订本。

尽管条件艰苦、困难重重,首版《毛泽东选集》还是于1944年5月(版权页时间)出版了。其中平装本分为5册,小32开,785页,印数2500册,封面所印“毛泽东选集”及卷号为红字,书名页题名及下方“晋察冀日报社编”为黑字,扉页印毛泽东免冠肖像一幅。精装本为合订本,由红缎、蓝垫作书皮,“毛泽东选集”字样为金字印刷,印数同样是2500册。

系统完整的编排体例

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收录《反对党八股》等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

需要说明的是,在该版《毛泽东选集》的版权页上,标注的时间为1944年5月,实际上,5月是发稿付排时间。在付排前,临时补充了6月份发表的《同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但版权页未变更。该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7月和边区人民正式见面,掀起了一股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此后,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四次增订再版。

《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许多中共党史专家认为该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个流传最早、最广的版本”。

这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根据地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翻开了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新的一页,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提供了最早的参照蓝本,为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据《学习时报》)

的小站,交替掩护。站点之间单线联系,任务交接时,事前约定时间地点,力求准时交接。

选拔交通员的高标准也是保障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安全畅通的关键。在所有要求中,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面临危险时,交通员必须保证信件、情报的绝对安全。交通员要具备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能够广交各界朋友,懂得各行“行话”,对形势了如指掌,还能以各种合法的身份或职业作掩护,以免引起敌人察觉。在各方努力下,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真正成为了一条“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从1931年建立到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逐渐停用,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和交通员在前后4年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和使命。毛泽东后来在评价这条秘密交通线时说,“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读史忆人 典故

志同道合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邓演达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对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执着,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在大革命初期就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经历十分丰富,实践非常深入,特别是毛泽东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各阶级、各基层进行深入的科学分析。因此,他对农民问题的阐释更全面,更具理论色彩。

而邓演达是在北伐过程中开始关注农民问题,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和土地问题委员会由他组织设立,每一次讨论的结论由他做;关于农民问题的提案和建议由他提交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会议由他召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运计划也是由他发布。

可以说,在解决农民问题上,毛泽东与邓演达既有共同追求,又各具优势。

但是,毛泽东关于发动农民和农村革命的举措,在中共党内曾遭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顾问维金斯基、鲍罗廷的一再否定。不仅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写出的《报告》,在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没能完整刊发;中共五大还改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撤销了毛泽东的书记职务。

当社会上(包括国共双方的上层人物)对湖南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的斥责声甚嚣尘上的时候,邓演达却独树一帜与实际考察过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形成共鸣,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农民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他们把乡村农民都组织起来,实行自治,结果,已把怠惰者、花鼓戏、赌博、鸦片烟和土匪都消灭干净,真是真明(命)天子也办不到的事,湖南农民倒办到了。”

对于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建树和组织才干,邓演达更是颇为看重。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邓演达不仅聘请毛泽东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还积极支持毛泽东创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和行动,委任他为农讲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1961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与他 and 邓演达共同的老朋友周谷城交谈时,再次深情地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据统战新语)

拾遗

刘文典的借书单

金克木年轻时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零工。一次,图书馆进来一位穿旧长袍的先生,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向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金克木接过去一看,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长准予借出。

金克木请他稍候,自己快步跑向四楼借书库。库内老先生看了书单就皱眉说:“这人不在北大教书,借的全是善本珍本,有的还指定抽借一册,而且借去一定不还。”这怎么办?老先生想了一会儿,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并让金克木照此行事。来人一听馆长换了新人,略微愣了一下,面无表情,仍旧一言不发,拿起书单,转身扬长而去。

金克木连忙抓张废纸,把借书单上的书名默写出来。怀着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以后有了空余的时间,便照单去找来查看。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金克木增加了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金克木后来成了北大教授,著名学者。他曾对朋友说:“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堂无言之课。”

那位借书人就是刘文典,他的一张借书单,让一个好学青年大开眼界,求知的道路更加宽广敞亮,获益终生。由此也证明了刘文典学问的精深。(据人民政协网)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知多少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当年七月,御史黄瑞麒奏请清政府办学一事。得到清学部批复后,遂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斗府营旧址建筑校舍,历时一年建成,达到招生初步条件。

翰林院编修傅增湘出任第一任校长。在抓教育的同时,也忙于政坛仕途,次年兼职直隶提学使,后升迁北洋政府内閣教育总长。傅增湘升迁后,无暇顾及学校具体事务,校长一职频繁交替。

举人出身且赴日留过学的毛邦伟,从1919年7月连干三任校长(其中一任为代理),任职期间顺风得水,1922年顺利交到许寿裳手里。

许寿裳是鲁迅好朋友,对教育事业满腔热忱,就任伊始学校发展建设立竿见影,但眼见的政绩却得不到学生认可,更有甚者还被学生送绰号戏弄。这让他感到还是一走为妙。许寿裳辞职时,推荐杨荫榆继任,并发出了“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的感言。

1924年2月,杨荫榆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师大校长,也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办学理念秉承西方教育之风,管理风格过于严格保守,因几位学生不守校规被开除后,引起相当大不良反应。沸沸扬扬的“驱羊”运动后,当局下令停办女师大。这只是个手段,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是女师大的延续,继续女师大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授课,这时校长是易培基。

易培基在任不长,又经过一阵折腾,胡敦复于1925年8月临危受命接任校长。这时女师大并非风平浪静,当校长与各方达成初步妥协后,才得以恢复女师大正常秩序。但终因当时北平并不太平,胡敦复始终未能取得与各方的共识,在难以应付复杂局势情况下,1925年12月离职回上海,但史料上记载的是他任职期限止于1927年。

1925年12月胡敦复离职后,接任者是留法女博士郑毓秀。又来一位女校长。但郑博士是著名女革命家,她能够对载沣、陆徵祥这样的人行刺,但对于像刘和珍这些学生则是束手无策。郑毓秀最终不堪女师大尴尬局面,于1926年初离职,去从事她得心应手的事情了。

随着时局的发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与可能了,1931年与北平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为现北京师范大学。(据人民政协网)

『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中华苏维埃的血脉”——红色秘密交通线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为解决党中央和中央苏区间联络问题,精心策划并缔造的一条从上海出发,经过港、粤、闽、赣四地,长达3000多公里的秘密交通线。它为传递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机密文件,运送中央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以及掩护党中央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迁移等工作作出了巨大而特殊的贡献,被誉为“中华苏维埃的血脉”。

1929年,朱毛红军入闽,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然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屡次“会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与党中央信息沟通不畅、物资供应困难以及干部紧缺等问题。因此,中央苏区十分渴望党中央的援助与指导。于是,尽快开辟一条隐秘且安全的交通线就成了摆在党中央和红四军毛泽东等领导人面前的紧急任务。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周恩来说过:“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1930年6月,毛泽东派遣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员会委员卢肇西前往党中央,请求建立从上海到赣南、闽西的秘密交通线。1930年7月,中央军委成立交通总站,同年11月归并中央交通局。周恩来要求集中3个月从各省调集精兵强将开拓长江线、北方线、南方线三条交通线,打通连接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大动脉。在周恩来的秘密领导和直接指挥下,1931年3月,中央交通局以闽西工农通讯社及其机要交通网为基础,正式建立起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直达江西瑞金的交通线,即“华南交通线”,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党的生命线”的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

(据人民网)